

文学研究与争鸣

文艺与经济关系的问题化 与再问题化

——论新时期文论转型与经济转型的关系

刘方喜

【提要】文论转型与经济转型密切相关。新中国建立以来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问题化与向计划经济体制的转型相关；新时期以来围绕文艺商品化、提高通俗文艺地位及金庸小说经典化、人文精神、大众文化等话题的学术论争，昭示着文艺与经济关系逐渐问题化的进程，而这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有关。在市场经济体系日趋成熟的今天，为了社会的和谐、均衡发展，有必要将文艺与经济关系再问题化。

【关键词】文论转型 经济转型 文艺与经济关系 问题化 再问题化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952(2009)05-0075-06

一、三个30年及文艺与政治、 经济关系的辨析

本文主要从社会经济体制的变化对文艺及其理论所产生影响的角度，考察中国现代文论90年、新中国文论60年的发展历史，以文艺与经济(市场)关系“非问题化—问题化”为基本框架，来考察新时期30年以来文论在整体上所发生的新变化，并根据当前文艺与市场关系“去问题化”的趋向，初步提出“再问题化”的理论思路。

文论的整体变化可以从多种角度加以描述，按传统通行的三分法，社会生活大致可以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文艺首先属于文化领域，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与经济的关系，也就成为文论研究的两大基本问题，而这

两大关系作为“问题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消长升降，大抵可以体现文论整体转型的历史轨迹。如果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话，那么，中国现代文艺及其理论的发展迄今已有90年的历史，1949年以前经历了第一个30年，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界，新中国文论的60年发展史，又经历了第二个30年与第三个30年。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必然会带来文艺生产和传播方式的转型，进而也会带来文论的转型。第一个30年，中国社会开始现代化进程，市场经济体制随之被启动；第二个30年是由包含市场经济体制在内的混合的经济体制逐渐向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型；第三个30年则是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大致说来，第二个30年文论的整体风貌与计划经济体制转型密切相关，其中文艺与政治关系作为一个重要“问

题域’在文论中相对突出；而第三个30年文论的整体风貌与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密切相关，其中文艺与经济关系作为重要“问题域”在文论中日趋凸显——两种关系或“问题域”的升降，构成新中国文论60年发展史的重要脉络。

政治、经济既可以作为“外部”力量作用于文艺，同时也可以作为“内部”力量作用于文艺。具体表现为：偏重于政治、经济价值功能的文艺与追求审美自主化的文艺之间的相互斗争——这在文艺观中就表现为：政治化文艺观、商业化文艺观与审美化文艺观之间的相互斗争。于是，从“外部”来看的文艺与政治关系，在文艺“内部”就具体表现为审美自主化文艺与政治工具化文艺之间的关系；从“外部”来看的文艺与经济关系，在文艺“内部”就具体表现为审美自主化文艺与商业消费化文艺之间的关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的分化、重组，文艺与政治关系、文艺与经济关系问题在文论中的消长升降，在文艺活动内部就表现为三种不同文艺观念的分化、重组——这在中国文艺的现代化进程中有同样突出的体现。在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文艺现代化的首演中，就已形成“审美自主型（代表人物是王国维、早期鲁迅、周作人等）”、“政教工具型（代表人物是梁启超等）”、“商业消费型（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三元并存的文艺观念格局，这一整体格局的变动、重组，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中一条极其重要的脉络，其中由市场支撑的商业消费型文艺的沉浮，清晰地昭示着中国现代文艺三种不同观念的四次重组：（1）第一次重组，经五四新文学家的激烈批判，鸳鸯蝴蝶派商业消费型文艺在理论上退出社会主导价值体制，但实际上仍在文化市场的支撑、推动下继续发展；（2）第二次重组，经20世纪30年代文艺大众化运动的不断批判，作为五四新文学观重要一翼的审美型文学观开始逐渐消退；（3）第三次重组，由于高度单一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退出中国社会（大陆）的运作机制，失去现实支撑的商业型文艺随之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审美型文艺观也受到进一步批判，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三向度，被一体化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单向度；（4）第四次重组，新时期以来直至当下，僵化的单向度

的文艺观逐渐被打破，被一度压制很长时间的另外两个向度开始逐渐恢复，而随着市场化的逐渐深入，商业消费型文艺已呈现出走向主流之势。

总之，文论重要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则逐渐转变为文艺与经济的关系问题，这种重要“问题域”的转变必然会带来文论整体的转型——文论转型与社会经济体制转型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新时期文论中文艺与经济关系由“非问题化”而“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密切相关。所谓“问题化”表明文艺与经济（市场）关系具有一定张力或紧张性而引起理论界较多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成熟，文艺与经济关系的紧张性趋于松弛，这就又呈现出了“去问题化（deproblematization）”的趋向。我们认为，今天只有将文艺与经济关系“再问题化（reproblematization）”，才能为中国当代文艺在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中进一步良性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思考。

二、新时期以来文艺与经济关系的问题化

下面首先通过对新时期以来相关学术论争的梳理，勾勒文艺与经济（市场）关系“问题化”的过程。

20世纪80年代围绕文艺“商品化”的论争，使文艺与经济关系初步“问题化”，即作为文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初步突显出来，而这种“问题化”与市场经济的转型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高度单一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文艺观念被逐渐高度一体化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单向度——文革十年体现了这种单向度文艺观念最极端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初的拨乱反正，在文艺上首先表现为对五四传统的恢复——与所谓思想解放同步乃至超前的“伤痕”、“反思”文艺，具有现代性的思想批判精神，“朦胧诗”更表现为对五四新诗现代性传统自觉或不自觉的恢复——但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全面地看，其实是表现为对五四时期

中国文艺现代化整体格局的恢复——在“雅”文学恢复五四传统的同时，20世纪50年代以来基本退场的“俗”文学再次登场——王先霈等主编的《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一书指出：“通俗文学的勃然兴起和持续兴盛，在80年代中国的文学领域，或者扩大一些，在这一时期全社会文化生活之中，都是十分突出的现象”，该书还收录了文学界对此的分析，“从社会物质生产的角度，把通俗文学的兴起归结为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文化现象，陈山把这种现象称为‘城市文化现象’，他认为通俗文学是城市化过程的产物，而城市化亦即社会生活市场化，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因此，城市化归根结底是众多论者所说的商品化”，^①说得再具体一些，“通俗文学的勃然兴起和持续兴盛”最重要的原因，乃是已停顿很久的“市场”这一现代社会的发动机，在中国社会中再次慢慢启动起来了。

随着经济市场化的不断发展，理论界出现文艺要不要也随之商品化的论争，文艺与经济关系问题初步凸显出来。陈文晓《社会主义文艺商品化——文艺繁荣的历史趋势》认为：“一部作品无论具有何等崇高的精神目的，如果没有票房价值，没有市场，那就算吃了败仗，失去了艺术的一切功能”；王锐生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精神生产与商品生产》一文中也指出：“我们所说的精神产品商品化，不光是说，精神产品采取商品形式，而是指精神生产完全受价值规律的支配，以利润为其生产的主要目的”；蒋茂礼《商品化中文学独立品格的沦丧》同样分析道：“文学商品化就决定了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尺度不是美学标准，而是利润标准”。^②——以上对文艺商业化运作机制基本特性的把握还是比较准确的。边平恕《艺术生产和商品生产》指出：“过去我们对艺术的范围和性质有一种褊狭的理解。把艺术理解为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否定了艺术的审美和娱乐的性质。对艺术性质的褊狭理解，导致了对艺术产品实行无价值主义，从而又否定了艺术成为商品的可能性”，^③商品化文艺观对传统单一意识形态化的文艺观确实有一定冲击——从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来说，商品化论争的理论意义在

于初步揭示出了意识形态一体化文学观念的片面性；从中国文学现代化三向度来看，商品化、意识形态化、审美化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许多人看到了商品化对意识形态一体化的冲击，却没有意识到商品化同时对审美化文艺观也形成冲击，而这种审美化文艺观在意识形态一体化中也曾是受到压制的。

改革开放政策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启动，必然会带来商业消费型文艺的复兴，在理论观念上必然带来学界对商业消费型文艺价值的重新认识。商业消费型文艺观的建构是双向的：如果说先锋作家创作的通俗化是由雅向俗的话，那么，由俗向雅就更能体现消费主义文艺观念建构——这具体表现为雅俗并存文学史的重写（所谓“两个翅膀论”）及金庸经典化等理论诉求，这些理论诉求使文艺与经济关系进一步问题化。《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一书可以说是新时期以来理论界对通俗文学现象所作的较早而较系统的理论关注。钱理群《现代文学三十年》把通俗文学的发展作为一种连续性的线索作了描述和分析。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对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早期发展更是作了大篇幅的论述。总体来说以上三书尚无竭力提升通俗文学地位的强烈诉求，而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则显示出了这方面的强烈诉求。该书《绪论》指出，以往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只涉及到了“半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而“文学的母体应分为‘纯’‘俗’两大子系”，“通俗文学除了娱乐消遣的本色之外，‘金钱主义’恐怕也应是它的一种本色。我们对‘金钱主义’的理解是局限于通俗文学的商品性”，通俗文学是“基于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以广大市民层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种被他们视为精神消费品的，也必然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近现代通俗文学具有它自己的特色，在发挥文艺功能上它

① 参见王先霈、於可训主编《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前言第2页，正文第72~73页。

② 分别参见陆梅林、盛同主编《新时期文艺论争辑要》，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1891、1937、1974页。

③ 《新时期文艺论争辑要》，第1949页。

完全可以与纯文学相互补。纯文学与通俗文学是各有其各自的审美规律的”，^①于是就形成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两个翅膀论”。袁良骏不同意这一观点，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与范伯群进行过面对面的论争。更具典型意义的当是对金庸的经典化，典型个案是现代文学研究资深专家严家炎对金庸武侠小说作的极高定位：“文学历来是在高雅和通俗两部分相互对峙、相互冲击又相互推动的机制中向前发展的”，金庸的艺术实践“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革命，金庸小说作为20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自当成为文学史上光辉的篇章”。^②而何满子等对金庸现象作了较激烈的批判。其实，对大陆文学、文化界来说，关键还不在于金庸小说的好坏，而在接受、抬高金庸小说时大陆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市场开始往文学、文化生产领域扩张。产生于较早步入商业消费社会的香港的金庸小说在大陆的经典化，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这恰表明大陆知识分子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自觉或不自觉的介入。

20世纪90年代有关“人文精神”的论争使文艺与经济关系更进一步问题化。尽管20世纪80年代已开始有文艺商品化的讨论，但总的来说，那时商品化似乎还没有对所谓严肃文艺创作形成多大冲击，严肃文艺的创作者们还在忙于思想解放和现代形式技巧的探索呢。但是，19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坚定不移地走向市场经济，市场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加强，商品消费化文学对纯文学的冲击可以说已经迫在眉睫了——这时候出现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首先正是对这种冲击的一种应对。论争起始于王晓明等《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一股极富中国特色的‘商品化’潮水几乎要将文学界连根拔起”，“一个走在商品经济道路上的社会渴求着消费，它需要、也必然会产生消费性的商品文学”。^③人文精神倡导者的理论贡献之一，在于揭示“金钱”其实与“政治”一样具有强大的排他性力量，而理论不足之一表现为有过分强调现代启蒙“先验性”之嫌，提出所谓“终极价值”、“只有人才会自愿舍弃物质生命去成就无形的精神理想”、“道德操守”、“殉道精神”、“天国的

尺度”等等——这给人文精神的批评者留下口实。王蒙《人文精神问题偶感》就首先是以这种“先验性”为批评的切入口的，认为人文精神的倡导者有将“精神”“与物质直至与肉体的生命对立起来”的倾向，“意味深长的是，从脱离物质基础的纯精神的观点来看，计划经济似乎远远比市场经济更‘人文’”，“而计划经济的悲剧恰恰在于它的伪人文精神，它的实质是唯意志论唯精神论的无效性。它实质上是用假想的‘大写的人’的乌托邦来无视、抹杀人的欲望与要求”。^④——所谓大众的“欲望”成了人文精神批评者的重要诉求点。

进入新的世纪，“大众文化”越来越成为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这与不断引进西方后现代主义尤其所谓“文化研究”等理论是有联系的，但市场在中国本土社会生活中以更强劲的气势不断地扩张，恐怕才是产生“大众文化”热更为内在的也是更为本土化的深层原因。《文艺报》2003年1月23日所刊登的王先霏、徐敏的《为大众文艺减负》一文从多方面分析了大众文化现象，指出：“文化经济化”与“经济文化化”乃是理解“大众文化”性质的基本点，“文化和经济的交融，是经济相对富足后，人们较低层次的物质消费需要得到满足，逐渐上升为带有审美色彩的消费需要的必然结果”。王、徐一文引起了争论，在论争中大众文化的多面性得到揭示。《文艺报》2003年2月22日刊登陈燕如的《丰盛的匮乏——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一文强调大众文化的“两面特性”，一方面“就目前方兴未艾的中国文化产业来说，大众文化产品如广告、影视剧、畅销书和流行歌曲等等，都对中国人民生活的民主化起着正面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大众文化所固有的消费主义属性使其不能免俗地创造世俗神话”，“消

① 以上引述参见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之“绪论”部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页。

② 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213页。

③ 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第2~15页。

④ 《人文精神寻思录》，第107~109页。

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扩散，是大众经济和大众文化协同发展的产物之一”。《文艺报》2003年3月27日刊登盖生《大众文化：带菌的小众文化》揭示了大众文化的“强制性”：“大众文化说到底是一种感官享乐性消费文化，也是一种鼓励物欲的商业促销手段，其时尚性具有裹挟压迫的塑造力，使人在心甘情愿的从众中，按照它的模式生存、感觉、消费”。《文艺报》2003年8月26日所载张永清《消费社会的文学现象》强调消费性社会中的文学消费“越来越受制于弥漫在社会中的各种消费信息、宣传广告”。

三、文艺与经济关系的去问题化与再问题化

以上通过对新时期以来相关学术论争的梳理，勾勒了文艺与经济（市场）关系“问题化”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世纪以来文艺与经济（市场）关系又呈现出“去问题化”的趋势：在实践上，“文化产业化”已逐步成为得到官方充分认可的文化发展战略口号，市场化日趋成为当代中国文艺发展的主导方式；在理论上，新世纪以来西方消费社会文化研究理论的大规模引进，成为非常突出的新一轮“西学东渐”现象，在围绕“日常生活审美化”等话题的相关学术论争中，文艺与经济（市场）关系的那种紧张性日趋消失——许多理论研究认为文艺与经济（市场）关系问题已不再成其为问题了——此即“去问题化”。

因此，大抵可以用文艺与经济关系的“非问题化—问题化—去问题化”来勾勒迄今新中国文论发展的宏观轨迹，而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再问题化”则是基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的考量。历史地看，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艺现代化三向度的发展非常不均衡：审美自主化向度在20世纪20年代五四运动初期及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这两个时期有短暂的发展，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政教工具化向度从30年代开始建构，至于60年代、70年代的文革时期而发展到极致；商业消费化文艺在五四时期虽然受到激烈的批判，但却一直发展着，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后才消歇，而1980年至今又强劲地发展起来了。80年代改

革开放初期，审美自主化问题是在文艺与政治关系中提出的，并没有在文艺与经济关系中被深究，所以，90年代面对文艺商业化浪潮，倡导人文精神的文学研究者却只有“先验性”、“终极性”的道德乃至宗教批判，深刻的审美批判本身反而缺席——这进一步暴露了作为现代化向度之一的审美自主化方面的理论建构和精神积累的严重不足。现实地看，改革开放之初“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念被纠正，审美的相对独立性在文艺与政治关系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而在今天，虽然没有人提出“文艺从属于经济（市场）”的极端口号，但对文艺与经济（市场）关系的“去问题化”实际上就是对“文艺从属于经济（市场）”的一种默认。如果说文艺的解放、审美的自主化在改革开放启动市场经济之初体现为对“文艺从属于政治”的纠正的话，那么，在市场经济体系日趋成熟的今天就应体现为对“文艺从属于经济（市场）”的纠正。

在文艺与市场经济关系中准确提出审美自主化问题，必须纠正两个紧密联系在一起模糊的错误认识。

一是认为倡导审美自主化就是要使文艺隔绝于“社会”，这种模糊、暧昧的观念实际上暗含着这样一种理论预设：所谓“社会”是由政治、经济构成的，政治权力规则、经济交换规则乃是社会的“现实”规则——文艺若不遵从这两种现实规则，就是“脱离”社会现实。这种理论预设本身实际上是非常有问题的，如果说社会生活整体是由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构成的，那么，包含在文化之中的文艺的审美规则就同样是“社会”本身的规则之一，而非社会之“外”的一种规则。在20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论争中，张颐武在《人文精神：最后的神话》一文中指出：“它（人文精神）被视为与当下所出现的大众文化相对抗的最后的阵地”，“‘人文精神’对当下中国文化状况的描述是异常阴郁的。它设计了一个人文精神/世俗文化的二元对立，在这种二元对立中把自身变成了一个超验的神话”。^①——人文精神倡导者对文艺市场化、大众文化的批判，确实有隔绝于

^① 《人文精神寻思录》，第137～141页。

社会现实的倾向,而这种“先验”、“超验”、“终级”批判往往缺乏现实力量。从审美自主化的角度对文艺过度市场化、大众文化中的消费主义所进行的批判,则可以把自身价值立足点建立在社会之“中”及大众感性经验之中。

二是在文艺与市场经济关系中静态地看待市场经济。在新时期以来有关文艺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论争中,一个总的趋向是市场对文艺的作用越来越被包容,如果静态地看市场,这一总趋向就会被解读为:在市场经济体制启动之初,人们的文艺观念还不够解放,所以还强调文艺与市场的对立,而今天人们包容市场对文艺的作用,是因为文艺观念已解放到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了。而事实是,市场绝非静止不动的: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社会生活整体中,市场经济确实是弱势的,对于社会整体发展来说,市场确实需要推动力量,那时对于文艺商品化的包容确实具有积极的解放作用;而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坚定不移地走上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市场及其规则在社会生活整体中日趋成为强势,在这种现实状况下再过度地鼓吹文艺市场化、文化产业化,其总体意义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就应加以充分审辨。

与以上两种模糊错误认识密切相关,许多人看到了文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审美自主化有

“脱离”社会的趋向,但却没有看到其实“经济(市场)”也有“脱离”社会的趋向——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把这种趋向称为“脱嵌(disembedding)”：“从根本上讲,这正是由市场控制经济体系会对整个社会组织产生致命后果的原因所在:它意味着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与经济嵌入(embed)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①政治、经济(市场)、文化(文艺等)等不同社会生活领域的不断分化、各自自主化,乃是现代化的重要现象,而在这种分化中,政治、经济(市场)、文化(文艺等)各自的社会力量并非均衡的,其中经济(市场)的力量无疑最为强大,而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则需要不同社会力量之间保持一定的均衡,强势的市场需要某种制衡力量——这是在市场经济体系逐步成熟的今天,审视文艺与市场关系、重视审美自主化的重要切入点。

本文作者:河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马光

^①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0页。

On Problematization and Re-problematiz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Economy

Liu Fangxi

Abstract: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ry comments transformation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Since new China is founded, the problematiz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s closely concerned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to the planned economy. While in the *new era*, the academic discussion centering on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literature, promotion of the status of light literature as well as classicization of Jin Yong novels; humanistic spirit and popular cultur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towards the market economy. Accompanied with more and more mature market economy in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re-problemati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economy for the social harmony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Key words: literary comments transformatio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economy; problematization; re-problematization